

# 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对话

## ——《一朵红红的玫瑰》和《情歌》诗歌语言比较

江玉娇<sup>1</sup>, 崔淑丽<sup>2</sup>

(1.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外语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2. 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一朵红红的玫瑰》和《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简称《情歌》)的诗歌语言体现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对话意味。前者采用确定性描述和确定性指称赞美爱情,歌颂个人情感,崇尚自我,其创作方法冲垮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城堡,它那与爱情命题相吻合的具有真值性的直言不讳的比喻使它成了诗坛上的爱情绝唱;后者采用不确定性描述和不确定性指称构成虚拟的交际语境,其创作摒弃了浪漫主义“直抒胸怀”、“惟我独尊”的诗学思想,以它那与爱情命题相悖的怪诞的隐喻但又具高度口语化的互动言语开辟了现代诗歌的先河,成为爱情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

**关键词:**《一朵红红的玫瑰》;《情歌》;语义学;语用学;对话;爱情命题

在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中,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以它那自然、朴实、直抒胸臆的语言告别了 18 世纪古典主义诗坛的陈词滥调,打破了它的清规戒律,又以它那奔放、热烈的情感冲垮了理性统治长达 100 多年的文学大堤,因此被誉为浪漫主义爱情诗歌的绝唱,世界诗歌的爱情经典;然而, 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它那犹豫、彷徨、极其复杂的内心独白的话语摒弃了 19 世纪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调子,又以它那虚拟的对话、隐喻的拼凑、言行的相悖这一新的诗歌风格打破了欧洲一千多年来形成的传统情歌形式,因此被称赞为“开创了英美现代派诗风”。<sup>[1]147</sup>这两首诗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都对它们时代的文坛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它们命题相同但内容相悖,题材相同但风格各异。本文侧重研究这两部不朽之作在诗歌语言中各自展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的绮丽风采以及它们对话意味。

### 一 文内照应与文外照应之间的对话

1. 《一朵红红的玫瑰》体现了语义上的一致性、连贯性和统一性

《一朵红红的玫瑰》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 - 1796)的爱情名

篇,它讴歌纯真、美好、永恒的爱情,崇尚主体,强调个人情感;它的话语热情率直,毫无虚伪和遮掩之意;它的文辞精炼,语篇结构严谨,句法结构简练。这些特征体现了一种“文内照应”(endophoric reference)的关系和语义上的高度一致性和连贯性。正如何兆熊教授所说:“文内照应是构成句子与句子之间,篇章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粘连的重要语法、语义手段之一,是构成篇章连贯性的一个重要因素。”<sup>[2]61</sup>

《一朵红红的玫瑰》还表达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外延意义,诗中词语所指的实体都存在于文篇之中,主体的思想在语言系统之内,不需要在特殊的话语语境中就可以得到理解:我爱我的爱人,她像红红的玫瑰、甜甜的曲子;我爱我的爱人,纵使大海干涸,烧作灰烬。诗行提供的信息就是句子带来的真实值相关的意义范畴,它和要表达的思想相吻合,具有真实值:玫瑰、旋律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大海干涸永不变心,化作灰烬爱永存”体现的是苏格兰乃至世界文化内容定型的这一习语的真实意义:爱情的誓言。根据 Frege 的理论,它们表达的是语义意义,体现了文本内语义的高度

收稿日期:2008 - 01 - 28

作者简介:江玉娇,女,湖南茶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外语系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崔淑丽,女,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用学研究。

统一性。<sup>[3]20</sup>

2.《情歌》展现了语用学上的言语行为互动的交际语境

《情歌》是 T·S·艾略特 (1888 - 1965) 早期诗歌的顶峰之作,也是西方现代爱情诗歌的代表作。它的主题、风格、语言、技巧运用及心理冲突的描写等各方面都突破了浪漫主义那直言不讳、热情奔放、欢快酣畅的情歌模式。杂乱无序的诗行、不确定的主体、没有逻辑关系的“情节”以及不连贯的句法结构使读者没法仅通过“文内照应”的关系来解读《情歌》,因为它更体现了“文外照应”(exophoric reference)的功能。何兆熊教授指出:“语用学研究所关心的是词语的文外照应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存在于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词语的这用法源于语境,它们的使用和理解又都有赖于语境。”<sup>[2]21</sup>《情歌》文本中人格分裂的主体“我”的整个话语是在一个心理交际的活动中进行。在交际过程中,主体“我”被解构成“你、他、她”,又被结构成“我们、你们、他们、他们”,各个角色的话语不断更迭,时而重叠。如果单从文内照应去分析文本的话,那没法找到这些指示代词的所指。因为他们的话语存在于语言和语境之中,是通过语境体现他们的言语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和《一朵红红的玫瑰》不一样的是《情歌》体现了语言中非指称性的特殊用法,诗中的不确定指称代词言语行为的互动使《情歌》构成了多个交际语境。语言学家和文体学家利奇曾指出:“有创造性的作家,特别是诗人,使用语言时尤其自由,喜欢使用各种交际手段……不用文学语言,比如说,埃兹拉·庞德和 T·S·艾略特在他们的一些诗歌中就采用日常会话。”<sup>[4]5-6</sup>《情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采用日常会话的形式,把诗中的言语片段组合成多个交际语境,表达了一个与传统爱情命题极不和谐的主题。如:《情歌》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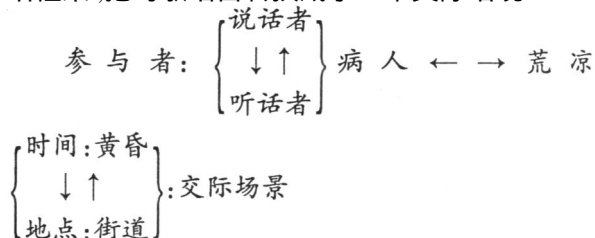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让我们走吧,你和我,)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此时黄昏正朝天铺开)

Like a patient etherized upon a table; (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

Let us go, through certain half-deserted  
streets, (让我们走吧,穿过某些行人稀少的街道,)<sup>[5]10</sup>

在诗首,诗人用了“Let us go”打开了一个对话框架,把诗歌语言转换成了一个交际语境:



如上所示,诗中包括了说话者与听话者以及言语交际的时间和地点,表达的意义是一个在纯概念之外的交际值: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角色在相互转换,参与者不健康的身心与“荒凉”的场景在呼应。接下来的交际行为都是在这种象征性的时间“黄昏”和象征性的地点“荒凉的街道”以及各个角色交替的语境中进行的。整个诗是由虚拟和真实混合的交际语境构成,它们分别是: (1) Let us go (2) Do I dare? (3) How should I presume? (4) Would it have been worth while? (5) Shall I...? 交际模式是一个祈使句和四个疑问句构成的一个大的对话框架,整个交际会话含义丰富。如第二个交际语境:“我敢不敢去‘谈恋爱’?”变成了“我敢不敢去打扰宇宙?”<sup>[5]12</sup>第三个语境:“值不值得‘走进宾馆谈恋爱’?”回答却是“把宇宙压缩成一个球,让它朝某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滚去。”<sup>[5]14</sup>所以,整个会话在违反了“爱情命题”的“数量准则、质量准则、方式准则、关联准则”(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准则)之后又回归到“命题内容”,<sup>[6]307-309</sup>直接宣告放弃去谈恋爱的行为:“我不是王子哈姆雷特……我老了……我老了……。我听见美人鱼在彼此面对面歌唱,但不是为我歌唱。……我们淹死在大海。”<sup>[5]15-16</sup>语境中交际者的心理的变化是从自信 怯懦 犹豫 怀疑 徘徊 绝望 放弃。Sperber在论关联论中指出:“这种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体 (psychological construct),不仅包括交际时话语的上文、即时的物质环境等具体的语境因素,也包括一个人的知识因素,如已知的全部事实、假设、信念以及一个人的认知能力。”<sup>[7]15-16</sup>

二 确定性指称词语与非确定性指称词语之间的对话

语言学家利奇指出:“纯指称语言作纯指称时,人们把语言表达式单纯用作指称某对象的符号而不考虑其本身涵义。语言作纯指称用的前提是使用者对历史的沿袭,对语言表达式与指称对象间联系的掌握。”<sup>[8]67</sup>《一朵红红的玫瑰》恰似利

奇所说,其中的人称指示词“我”和“你”所指明确,没有任何歧义,“我”是诗中的主体,“我”的话语就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你”并非他人,而是“我”心中的恋人,因为诗中“我”把“你”比作“一朵朵红红的玫瑰”、“一支甜甜的曲子”。“玫瑰花”和“优美的曲子”象征着“甜美的爱情”是文学常规意义。因此,诗中确定性的指称和确定性的描述表明了主体“我”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半点犹豫,读者看不到一般抒情诗歌那回肠百转式的含蓄表达,主体毫不遮掩的敞开心扉,直白、大胆地在爱人面前立下誓言:直到大海枯竭水流尽,我仍然爱你,直到岩石被太阳晒成灰,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仍然爱你,哪怕来生在迢迢千里之外,我仍然要回到你身边,再续前缘。其次,诗中的“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是“我”是说话者,“你”是“我”表述的对象,两人没有构成言语行为的互动关系,因为诗中只有“我”在动态话语中,而“你”在静态中,倾听着“我”的真情表白。因此,诗中的“我”借用确定性描述语:红红的玫瑰、甜甜的曲子、海枯石烂向确定性指示对象“你”表达了一种确定性的纯指称意义,以此来告诉读者“我爱你——我的爱人”。

追根溯源,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影响,开始重视人的自由、自在和自为性,并开始重新认识“自我”、“审视自我”,从而进一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正是由于对“自我”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追求,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才告别了18世纪诗坛的陈词滥调,与欧洲各国的先驱们一起开始以作品为宣泄口,追求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张扬个性解放,以锐不可挡之势冲破了理性统治长达100多年的文学大堤。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此摆脱了理性的束缚,由传统的描摹自然,重视理性转向了描摹自我的内心世界,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以“自我”为中心建构自我的浪漫世界,以“语义理据”(semantic motivation)为中心构建语义的统一性(semantic unity)。<sup>[9]473</sup>

然而,《情歌》中代词繁多,关系复杂。他们的关系用图所示如下:



人称指示用语在《情歌》中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人称指示词在《情歌》中的语篇中体现了它们的自足封闭性(closed self-sufficiency)。即:不管主体“我”是怎样分解或组合自己,“我”始终位于中心点上,言语活动是主体“我”与“我”分解的多个角色在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交换中实现,也就是由说话主体与由主体解构的听话者相互作用而发生展开。这体现了 Lyons 提出的“会话过程中指示词语之间的相互更替、相互作用”的观点。<sup>[10]637-638</sup>

(2)人称指示用语在《情歌》中体现了它们的开放性功能。所谓开放性,是指由自足、封闭的人称指示符号系统所指代的人或实体的不确定性或变化性。<sup>[11]576</sup>《情歌》中的主体“我”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换身份。在第一节诗中,主体“我”本来是一个人去“谈恋爱”的路上,可迟疑了一下,摇身一变就成了“Let us go then, you and I”。在此的“我们”和“你”就是指代词“我”,经过对周围环境进行一番勘测后,主体“我”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一切)把你引向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第10行),这个“你”不是别人,也正是主体“我”自己。接下来的诗行就在“你”和“我”的较量中走过青年时代进入中年,向老年过渡直至死亡: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你也有时间我也有时间,……还有时间犹疑一百遍,我老了……我老了……有人在呼唤我们,我们淹死在大海里。<sup>[5]11-16</sup>

(3)在《情歌》中的语境里,“我”是真实的主体,真实的自我——普鲁弗洛克。“你”、“我们”、“他们”、“她们”以及“他”和“她”一起交织在交际的语境中,并频繁地出现,始终在普鲁弗洛克身边,若隐若现,构成众多的平等对话。对话有时代表着主体自己的情绪,与真实自我的思想保持一致,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抵触,出现对立,构成了一个既统一又对立的对话话语语境。正是这种复杂的会话心理构成了普鲁弗洛克爱情行动的延宕。同时,这种特有的对话方式说明了人称指示语在语篇中的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ity)的指称意义以及语用功能上的交叉互指(cross-reference)和包揽所指(inclusive reference)的特殊功能。<sup>[12]204-209</sup>

(4)《情歌》中的指示用语“我们、你们、他们以及她们”四个复数代词交织在同一个语境中使用,代表多种意义。1)增强“我”去“谈恋爱”的自信心;2)缩短“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使读者在

感情上产生“同类感”,以此来造成增加多方的共同点的假象;3)普鲁弗洛克的精神状态被转化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反映西方人共同的病态心理,揭示一战后西方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丧失、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的状况。

《情歌》中的不确定指示词语的用法就是艾略特对他本人提出的“非个性化”理论的一个充分验证。“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sup>[13]6</sup>“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sup>[13]5</sup>《情歌》中不确定性人称指示代词的胡言乱语和构成文本的多个不确定性描述体现了诗人独有的创作风格:诗行和语境(context)及情景(situation)之间构建了一种互动关系,文本的内在语义结构转换成了语用结构形式。由此,进一步发展了诗歌语言的语用功能。

### 三 真值条件下的比喻与违反会话合作准则下的隐喻对话

在《一朵红红的玫瑰》中,诗人运用火红的色彩、玫瑰的芳香、优美的旋律,从甜蜜的诉说到激昂的誓词,犹如恋人情不自禁的倾诉,娓娓道来,就像山间溪流肆意流淌,淙淙而下,引起人们的共鸣。然后笔锋一转,好似溪流变成了瀑布,满腔热情奔涌而下。有了前面的铺垫,诗人接着借用了“岩石”、“太阳”、“大海”来表达他矢志不移的爱情: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珍重吧,我唯一的爱人,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但我定要回来,哪怕千里万里!

诗行中的比喻、夸张、借代的修辞手法把沉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的那种欣喜若狂、销魂落魄的感觉,以及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颠峰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修辞意义展现了词义中的修辞色彩(rhetorical coloring),其内容直接满足了爱情命题的条件,具有真值条件语义(truth conditional semantics):<sup>[14]30</sup>玫瑰、旋律、海枯石烂使“爱情”命题得到实现,其话语意义表明了语义修辞的规约意义。另外,诗中波澜起伏的情绪和诗行中的四步抑扬格(iambic tetrameter)与三步抑扬格(iambic trimeter)交替节奏的平行结构(alternative rhythmic parallelism)相融合,恰好体现了内在的节奏和外在的句式节奏(syntactic rhythm)在语义中的音乐

美。<sup>[4]111-113</sup>在用韵方面,前两个诗节采用了二、四行押韵的方法,而三、四诗节则采用了隔行押韵的方式,诗中固定的韵律使得诗行进发出一种和谐美、对称美和永恒美,有效地表达诗人的情思。

然而,从青年时代走进中年时期的过程中,普鲁弗洛克总是处在“爱情行动”的跃跃欲试中。他对爱情追求的内心冲动因行动的延宕而一次次地消失,最后酿成爱情悲剧:“于是我们淹死在大海里”。在此,艾略特运用了许多奇特的修辞手法,特别是隐喻,反复出现在他虚拟的会话中,伴随着每组对话,违反着会话合作准则,使文本产生了丰富、离奇的会话含义。这些准则的违背表现了普鲁弗洛克的言语行为与心理忍受的综合症状:言语与行动对立,行动与自信相悖,自信与勇气分离,勇气与犹疑纠缠,犹疑与决心交织。这注定普鲁弗洛克永远尝不到爱情的滋味。

例1:诗的开头:“让我们走吧,你和我,普鲁弗洛克已下定决心要走进宾馆和女士们攀谈,正要行动时,他却说“夜色在天空的映衬下,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被麻醉的病人”。例2:在第11~22行(因为篇幅有限,诗行省略)的交际语境中,普鲁弗洛克对“What is it?”问题回答了一系列不切题的话:黄色的烟和黄色的雾落在窗台上,缓缓地包围着夜晚的每一个角落,猫用背脊和口鼻摩擦着窗户玻璃,用舌尖舐黄昏的各个角落,徘徊在排水沟的水潭上,偷偷溜过阳台,纵身一跳,看到了柔和的十月夜晚,最后蜷起身子睡着了。<sup>[5]11</sup>这个会话包含3个隐喻:“黄色的烟、黄色的雾以及鬼鬼祟祟的猫”。例3:在第53~60行中,对话篇中“So how should I presume?”我该如何实施(谈恋爱的)行动呢?的问题,普鲁弗洛克运用了两个隐喻,把自己比作小爬虫和海底的螃蟹:被公式化与狼狽地趴伏;被别针别住与挣扎在墙上。<sup>[5]13</sup>诗中的隐喻“既不切题,又不简洁,既荒谬又茫然”,与诗中的命题条件相去甚远,最终导致爱情命题的失败。

《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形式上采用了四步抑扬格和三步抑扬格的交叉格律,并使用了大量的短元音,诗行显得干净利索,节奏明快,并与诗中主体那慷慨激昂、情感飞扬的思绪并驾齐驱。因此,诗歌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充分展现了语言的音乐美,增强了语言的艺术效果,加大了情感渲染力度,这体现语音(phonetics)功能和意义(sense)

功能的之间建立起来的语义关联(semantic correlative)意义;其次,诗人采用了“语义排比”(semantic parallelism)的写作方法:<sup>[4]137</sup>“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这种排比使整个诗歌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给读者以整体美;其三,诗中展现了“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关系的结构模式:<sup>[9]474</sup>爱情命题的确定性,支撑爱情命题的比喻语言形式,说话者“我”和被表述的对象“你”的确定性关系,给读者以和谐美;其四,诗中体现了“语义的统一性”(semantic unity):<sup>[9]474</sup>玫瑰、旋律象征着美好的爱情,海枯石烂、千山万水象征着坚贞不移的爱情。《一朵红红的玫瑰》讴歌美丽的爱情,崇尚个人情感,不愧为诗歌史上的一首爱情绝唱。

在《情歌》中,艾略特通过高超的诗艺技巧,把指代、言语行为、行为准则揉合在一个由多个交际场景构成的“情节”中,使文本产生语境效果,正是这个语境体现了文本中一个完整的隐性结构;其次,文本中抽象但又生动,模糊但又明晰,晦涩难懂但又高度口语化的互动言语丰富了诗外第三人称“情感”的经验,扩大了“诗意”的语义意义到语用功能,使诗境具有真实感;其三,透过诗中怪诞的比喻、不连贯的引语和典故的拼凑、不和谐的“音符”以及主体那“完完全全的狂言乱语”,<sup>[15]417</sup>我们看到了诗中那种行散神合的独特结构,那种貌似放纵无羁、实为苦心经营的语境创设策略;其四,长短不一、行数不等、或整齐或参差的诗行以及两行一韵、隔行押韵、三行一韵(while, smile and ball)或四行押韵(thin, chin, pin and thin)的自由体是主人公混乱的意识及捉摸不定的情绪的凝结和外化,体现了“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之间隐含的关联性,<sup>[16]24</sup>并给读者以启示:优秀诗歌应该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品。《情歌》实践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理论,它的创作手法摒弃了浪漫主义的表现论和惟我独尊的诗学思想,使他成为西方现代诗歌的先驱。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悲剧成了现代爱情悲剧的一个代名词。

#### 参考文献:

- [1] 汗密尔(Hamilton, I). 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歌词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2]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3] Frege, G (1952). On Sense and Referenc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4] Leech, Geoffrey N. (2001).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5] 艾略特. 艾略特诗选[M]. 赵萝蕤,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 [6]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7] Sperber, D. & Wilson D.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8] 杰弗里·利奇. 语义学[M]. 李瑞华,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 [9] 劳允栋. 英汉语言学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0] Lyons, John (1977). "Deixis and anaphora" In T. Myers (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rsation and Discours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1] 束定芳. 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12] Brown, Penelope and Levinson, Stephen (1978).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E. Goody (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3] 艾略特.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 李赋宁,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 [14] Thomas, Jenny (1995).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15] 杨吉深. 英国文学选读[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16] Cook, Guy (1994).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黄声波)

## ABSTRACTS

### (1) The Design and Impact of "Device-typed" Sole of Contemporary Sports Shoes TANG Yong(004)

*College of Fine Ar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0, China*

**Abstract:** The "device-typed" sole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ports shoes. It refers to the special-structured device in the sole which provides more efficient protection and counter force than sports shoes made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addition, this device makes sports shoes lighter. The device-typed sole attributes its exquisite structure to the employment of high technology. Device-typed sole has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sports shoe design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of commercial competition and marketing. Despite its present drawback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evice-typed sole design has become the major drive of sports sho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shoes; device-typed sole design; shock-absorbing system

### (2) A Dialogue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Comparison Between A Red Red Rose and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JIANG Yu-jiao, Cui Shu-li(010)

1.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A Red Red Rose and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respectively reveal som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in poetic discourse. The former uses definite descriptions and referents to sing highly of love, personal emotions and individualism, destroying the rationality-armed castle by Classicists; besides, it also employs some overt and explicit similes and metaphors which are of truth value to the love proposition, making itself the perfect in love poetry history; whereas the latter uses indefinite descriptions and referents to construct a virtual communicative context, casting a way "bold expression of emotions" and "ego-oriented poetic theory" by Romanticists; it also employs quite a few covert and implicate metaphors which go against the love proposition but are highly communicative, making itself the beginner of modern poetry and an exotic flower among the love poems.

**Key words:** A Red Red Rose;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semantics; pragmatics; dialogue; love proposition

### (3) The Benefactor and New Fiction of France

CHEN Wen-gang(015)

*Chinese Depart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Sonta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New Fiction" of France in 1950s when writing her maiden work, The Benefactor. In the novel the plot is deconstructed, the characters and narrator are banished and only a labyrinth of narrative form is left, which declares the end of trust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This creation is essentially an experi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Fiction".

**Key word:** Susan Sontag; New Fiction form; narration; character; realism; narration